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九五期 ——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4e)

【回首文革】	“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干校	霞 飞
【史海钩沉】	江青与小靳庄	胡学常
【人物春秋】	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	湘 人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回首文革】

“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干校

• 霞 飞 •

对“五七”干校，年龄稍大一点的人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结束的？对此，许多人就不一定了解。

◇ 毛泽东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劳动形式

自从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女儿也是特殊的。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

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另一个批语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笔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此外，毛泽东在1964年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很关键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可见，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但是，在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找到一个将干部统一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的好形式。

◇ 林彪寄来的一份报告，引出了毛泽东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而且，从面上看，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思路，却不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与他1958年所设想的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转“五七指示”时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

◇ “文化大革命”中的机构精简，使机关干部的安置成了一个大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成立。这样，全国（除台湾省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此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重点，由地方转入中央各部。

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90个。毛泽东决定，在这些机构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实行精简的方针。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向毛泽东建议：现在中苏关系紧张，可能马上打仗，应该对一些重要的部委实行军管。毛泽东当时也估计到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便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于是，林彪先后派出军队干部，对18个部委实行了军管。在这些参加军管的军队干部中，有很多是林彪的亲信。这些军队干部到这18个部委后，由他们组织领导班子，建立革命委员会。对那些没有宣布军管的部委，林彪以各种理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派军队代表去那些部委掌握领导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也要以军队干部为主，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核心。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这些单位里原有的干部，大

部分没有得到安排。这样，就又出现了许多没有工作的富裕干部。

同时，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毛泽东也考虑到了精简问题。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时，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实际上，那时地方都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此时所说的“精兵简政”，主要是针对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来说的。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毛泽东于1969年1月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机构精简的原则。在精简原则和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下，中央开始全面考虑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27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18%（实际上，原干部留用少于18%，因为有后派来的军队干部占了一定的编制——笔者注）。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员会。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进行了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有些部委被撤销。这样一来，在中央机关里，富裕出来的干部数量就更多了。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精简之后，多出来的干部数量，当时虽然没有数量上的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安置精简出来的干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被打倒的干部的安置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干部的热潮过去之后，有大批干部被关进了“牛棚”。但是，当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转向争夺本单位、本地区领导权时，大家谁也顾不上管“牛棚”了。何况谁管“牛棚”谁就要花费人力，还要承担被关押者自杀或者逃跑的风险。于是，各造反派开始相互推来推去，最后谁也不管了。被关在“牛棚”里的干部到底往哪儿安置？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许多地方的负责人，包括接管一些单位权力的军代表、工宣队负责人，都纷纷向上反映这一问题，请示如何处理关在“牛棚”里的干部。这个问题自然逐级地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时也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等待安置的问题。

◇ 柳河“五七”干校被树为典型后，各地纷纷仿效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发愁。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人仍然闲着无事做。后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问题。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后，还可以继续建房、开荒、种树、办小工厂，为安置第二批干部创造条件。去柳河的干部，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

力而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很容易接受。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柳河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这个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上发表。经验材料中说：办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干校耕种土地3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姚文元接到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后，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上来的材料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题目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他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这个由姚文元写的按语说：毛主席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姚文元写好这一按语后，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同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编者按。

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央办公厅，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 “五七”干校“改造”和“锻炼”干部两种功能

“五七”干校有中央办公厅办的，有中央各部办的，有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有地市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也有县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五七”干校也分为几类：有的以农为主，有的以林为主，有的以牧为主……各地的“五七”干校还办有加工厂，生产一些轻工业产品，还搞了不少副业生产。各地办的“五七”干校，大多建在当地条件较好的地方。这样，当年或第二年，即可以实现生产自给。一般来说，“五七”干校的机械化程度比当地农村的水平要高许多，生活条件也比当地农民要好一些。但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单调的文化生活以及较差的生活环境，使不少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人感到是处在艰难困苦之中。

一开始，黑龙江省办的柳河“五七”干校，主要是为了安置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毛泽东的批示下来之后，中央各单位、各地各单位办的“五七”干校，就不能只限于

此了。因为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指出，“除老弱病残者外”，广大干部都应该下放劳动，“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而且，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女儿也送到中央办公厅办的“五七”干校去锻炼。《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说得更明确：“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这些话所表达的含义是：包括通过造反当上革命委员会领导干部的人，也要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在造反派眼里，他们到“五七”干校，不是去“改造”，而是去“锻炼”。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求——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青春”才去“五七”干校的。

“五七”干校的两种功能，针对的是两部分不同的人。这两部分不同的人，结局也大不相同。精简下来的干部、“牛棚”里的干部及其他一些干部，是去接受“改造”的，因此，他们大多举家搬迁到了“五七”干校，一去就是数年，在那里长期劳动。并且在开始，一点回城的希望都没有。他们在干校里，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劳动。连年老体弱的人，每天也要去干那些很重的体力活。他们的子女到了一定年龄，也要参加劳动。这部分人中，有些仍然有亲属在城市，但他们一年也难得回城一次。许多科技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在“五七”干校那种条件下，也只能干体力活，而不能从事专业研究和创作，他们的大好年华就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单调的生活中消逝了。一般来说，除了“牛棚”里的干部外，其他干部去“五七”干校，是定期轮换的。但由于轮换的比较频繁，也使他们荒废了业务和专业。

另一部分人，即靠造反起家的人，到干校后，大多都担任大大小小的头头。他们一般不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参加一点体力劳动，也是轻微的。有的则干脆搞一些花架子，走一走形式了事。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对“五七”干校中的广大干部进行监督、管理。那时，“五七”干校实行的是军事管理制度：起床是定时的，然后还要点名，排队出工；收工也要排队，回来后也要点名；休息时间是定时的，到时间就统一熄灯。由于当时处于战备时期，“五七”干校也搞一些军事训练，但并不发给武器，只是让他们挖壕沟。各地的“五七”干校都办有食堂，凡是干校的人，都在食堂吃饭。这一系列的环节，都有人监管。于是，造反派干部便成了“五七”干校里面大大小小的监管干部。这些人一般只在“五七”干校呆很短的时间。他们回去以后，就算镀了一层“金”，有了进一步被提拔的“资本”。

◇ 冷清下来的“五七”干校最终被新恢复的党校所取代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的注意力也转到了这些事上面。同时，原来的闲置干部既然得到了安置，也就不大引人注目了。

1971年底至1972年初，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率先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并恢复他们的工作。此后，各地在解放老干部问题上，也有所动作。这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一大批“牛棚”里的干部，得以陆续离开“五七”干校回城，这使仍在那里劳动的其他人也开始不安心起来，他们纷纷回城申诉或找关系，争取早日从“五七”干校回城。

这些情况使“五七”干校逐渐冷清下来：在那里劳动的人越来越少，部分农田也荒芜了；原来住满了人的宿舍空了一大半；农业机械闲置在那里生满了铁锈；牲畜也没有人喂了，有的干校干脆把牲畜大批杀掉吃肉；还有的干校将所办的小工厂停产；在食堂里吃饭的人和做饭的人，都少了许多。

这种冷清局面，从1973年开始即已出现，到1977年，足足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在这四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对“五七”干校的事情都很少过问。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

应景学习班的场所，但当各类学习班一结束，“五七”干校就又呈现出一派冷清景象，有的只留下三五个人看守房舍和农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许多人都说，办“五七”干校是“四人帮”迫害干部的手段。中央虽然没有对此下结论，但各地各级的“五七”干校却更加冷清了。不少“五七”干校把土地划归当地公社耕种，而他们办学习班时，则大多在城市里找机关会议室来开办。在“五七”干校工作的干部，也大多把家属安置在城里，他们本人则成了不经常去干校上班的“通勤干部”。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决定》指出，办好各级党校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事业。不但要把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坚强阵地，而且要把党校办成一个发扬光大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

10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经过认真的准备，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中央党校开办之后，各省、地（市）、县的党校也陆续恢复招生办学。原来在各地各级“五七”干校中所遗留下来的教职工，也随即合并到党校系统之中。有的则是在原“五七”干校教职工的基础上，扩大人员后，复办党校。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

□ 《党史博览》2005. 3

~~~~~

# 【史海钩沉】

## 江青与小靳庄

• 胡学常 •

小靳庄当时是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一个大队，不过是一个只有101户、582人的小村庄。那时的一份宣传材料说，解放前的小靳庄是地主的一个佃户村，“广大贫下中农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劳动人民翻了身，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一直到成立人民公社。但是，“文革”前的小靳庄，亩产停留在一二百斤左右，仍是一个“老大难”的穷村庄。后来，“广大社员群众平整土地，建设园田，挖渠引水，广开肥源，从而使农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个宣传性的说法，自然不可全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小靳庄确实有了一些发展，1973年，这个村庄被评为天津市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尽管已经是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小靳庄也还是比较落后，不用说在整个天津市，就是在全宝坻县，这个村庄也不算突出。但是，江青来到了天津，来到了小靳庄，这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庄，也就随之开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 ◇ 江青“发现”小靳庄

1974年6月17日，江青来到天津。此前，天津市委负责人解学恭、王曼恬诸人，按照江青等人的旨意，在天津的一些基层单位点起批林批孔的烈火。天津站的工人，成立了三结合理论小组，用儒法斗争的观点讲解历史，登上了史学讲台，甚至还编写了一部《儒法斗争史

讲稿》。工人所谓的“革命创举”，被反映上去，还写进了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江青得知这个消息，觉得大可利用。这样，江青便率领迟群、谢静宜，还有“梁效”写作组等一批人马，乘专列赶到天津。此次出巡，搞得十分神秘。据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记述，他们上了专列，仍不知道将要去哪里，去干什么，到了目的地，看了站牌，才明白到了天津。住进招待所，又向他们传达了三条禁令：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上街。

6月19日晚，江青主持召开了一千余人参加的儒法斗争史报告会。这是一次漫长的大会，从晚上7时30分开到次日凌晨，由天津站工人主讲所谓“贯穿中国历史的儒法斗争史”。江青也有一个长篇讲话，通篇东扯西拉，荒唐可笑。

江青等人此次来天津还跑了几个地方，其中就有小靳庄。刚批判“四人帮”时，解学恭揭发说：“江青第一次来天津时，听了介绍给她的几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都不感兴趣，唯独听到小靳庄时，如获至宝。”

#### ◇ 江青在小靳庄的“政治秀”

6月22日，江青一千人来到小靳庄。到了某个地方，江青一般会说，“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好”。那天上午11时许，江青照例如是说，小靳庄的社员激动得不知所措，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不料，江青却回应道：“不要喊这个，不要学林彪那一套。”甚至还补充了一句老实话：“活到万岁也得死呀！”

江青很快就要求下地。她身穿裙子，脚登白色凉鞋，在众人前呼后拥下，来到正在收割的麦田。江青见到麦子，非要割麦子，众人无法，只好让她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江青割下一小把麦子。众人知道江青在表演，但嘴上还说她割得很地道。

出了麦田，又来到麦场。江青对场上的女社员说：“我身体不太好，到你们这儿来就是锻炼。”说着就要翻场。对于江青来说，翻场可能难度更大些。她翻了半天，竟然一叉也没有翻起来。不过，她摸过的叉子，连同她用过的镰刀和割下的麦子，在“四人帮”垮台前都被当作“革命文物”珍藏在小靳庄。而且，在那一段时间里，一批又一批来小靳庄参观取经的人们，大多要和这些叉子、麦子、镰刀在一起合个影，以见证一种奢侈的“幸福”。

表演完了下地劳动，吃过午餐，江青还要午睡。她有言在先，说自己神经衰弱，睡眠时一向不能容忍任何声响。要让人不出声比较容易，可要让小靳庄的鸡不鸣狗不叫，确实有困难。江青发话了：“那就暂时委屈委屈鸡鸭狗吧。”她的意思是要把鸡鸭狗暂时圈起来。说圈就圈，干部社员雷厉风行，终于把这个中午弄成了一个寂静的中午。

江青睡得不坏。接下来，进入江青在小靳庄一天的正题——召开批孔报告会。会前，精心准备的一批批孔材料早已分发到社员手中，江青说：“材料给你们，这不是礼物，我们来向你们学习！”开会了，最先开讲的是老共产党员王树青，江青不停地插话，先是同这位老共产党员一起声讨大地主李九的“驴打滚儿”盘剥，接着批判孔老二的男尊女卑思想，呼唤男女同工同酬。王树青讲完了，江青嚷嚷要“半边天”讲，一个名叫郭淑敏的“半边天”开讲了，江青又批评她不该让男人先讲，“下次你们要勇敢一点，啪的一下站起来，不叫男同志先讲”。进而又说：“你们这里现在还男女同工不同酬，半边天不是半边天，这是大男子主义。”郭淑敏批判孔老二，越批越气愤，突然反问道：“孔老二说我们妇女无用，我们是无用吗？”这一问问得好，再次激活了江青的女权思想。

来到小靳庄批林批孔，江青一开始即设计好了两重用意，一重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另一重



是批男尊女卑思想以力倡女权，为自己的夺权制造舆论。所以，郭淑敏的反问，再次给了江青一个机会，她打断郭的话，说：“马克思说生产力中劳动力是最主要的，劳动力是谁生的，是女人生的，这是超过他们的。”说着说着江青也就不顾忌什么了，非常露骨地说什么中央不合理，在政治局就她一个是单干户，“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的时候，都出来了，一把抓，就我这一个，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要我”。

在小靳庄，江青还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厌其烦地为人改名。面对每一个人，江青几乎都有“正名”的冲动。轮到又一个“半边天”王淑贤开讲，刚自报家门，江青就怂恿她造自己名字的反，说是又有淑又有贤，《三字经》里全有，要改成“王树先”或“王先”，由王淑贤挑一个。又有“半边天”于瑞芳，江青觉得“瑞”字特别要不得，同样透着《三字经》气味，于是为她改名“于芳”。老贫农魏文忠刚报告“我叫魏文忠”，江青就批评他的名字太封建，后来，这个老农自己给自己改名为“魏文中”。又有一个王孝岐，这个名字把江青吓了一跳：“啊呀！你这个‘岐’字改了吧，周文王啊！”最终，王孝岐获得了一个完全革命化的名字，“王灭孔”。江青在小靳庄最著名的改名，发生在一个名叫周福兰的妇代会主任身上。周福兰也是负责接待江青的人员之一，江青见面就问她的姓名，又问是哪几个字，周答：“幸福的福，兰花的兰。”江青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周诚惶诚恐，江青就为她改名“周抵周”或“周克周”，说是要“抵抗奴隶主头子周公”，或者“克制周公”，“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这些被江青命名的新名字，在随后公开出版的《小靳庄诗歌选》和《小靳庄批林批孔文选》里，都曾经反复出现。

来到小靳庄，自然少不了读读诗唱唱戏之类的活动。那个名叫于瑞芳的“半边天”汇报说自己写了74首诗，江青夸她“了不起”，又要她当场朗读自己的诗作。批判会场转成文娱会场，然后是大唱样板戏，社员唱，江青带来的人也唱。浩亮唱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唱着唱着还表演起来，江青当仁不让做了李奶奶。演员出身的江青一下子就进入了表演状态，说：“铁梅，拿酒去！”紧接着拿了酒，面对浩亮，一副庄严而又深情的模样，说：“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浩亮作一饮而尽状，同样深情而庄严地说：“谢谢妈！”然后唱《浑身是胆雄赳赳》。

下午6时30分，江青一行离开小靳庄。临行前，江青唤人拿出带来的发卡，亲自为五位青年社员卡上。她一边卡一边对女人头发进行阶级分析：“头发只能齐眉，所以古人叫‘齐眉穗儿’，地主阶级叫‘刘海儿’。”又告诫紧跟在旁的解学恭：“要多生产发卡，为妇女们服务，不然把眼睛都弄坏了。”依依惜别之际，江青庄重地宣告小靳庄是她和解学恭两人的点，并敦促解要多来，“我这个人也不知道白天黑夜地干，我的点几个月见一次面，没有办法”。

三个月后，9月24日，江青陪同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再次来到小靳庄。这位来自马尼拉的前美丽女王的中国之行，竟然为江青提供了又一次难得的显山露水的机会。罗斯·特里尔的《白骨精——毛泽东夫人传》记述了江青的此次“政治之旅”：“农民们为两位来访的夫人唱歌跳舞，表达他们政治上的好斗精神。在参观牲畜栏、玉米地和面粉磨坊时，江青向她的菲律宾客人扼要重述了，她仲夏时节在天津一次讲话的主题。”江青向菲律宾前女王称颂了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女王”，她问马科斯夫人是否知道中国的武则天，那可是一位“比男人还有力量”的女皇帝。又问她是否听说过汉朝的吕后，那可是位“封建时代伟大的女政治家”。

从仲夏到初秋，江青的两次小靳庄之行，使这个村庄在全国迅速窜红，也使天津成了“女皇的城市”。“女皇梦”做得正酣的江青，也幻想着有朝一日像武则天那样，临朝改制，变换服色。在天津，她让人按照旧戏中武则天服装的样式，设计制作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是为“女皇服”。又指导服装设计人员翻阅史籍，参照旧戏舞台上和历朝贵族夫人、小姐服式，设计制作开襟领裙衣，是为“江青服”，并以此作为“国服”在全国妇女中推广。当时游历过天津的韩素音回忆说：“几乎每个商店的橱窗里都挂着至少一件同式样的浅色女装——宽松的裙子，V字领。

这就是江青装，是由她本人设计的”，“所有的裁缝都接到指示，他们只能做这样的衣服，不准做其他式样的，中国的妇女都要穿这种衣服”。

#### ◇ 小靳庄成为江青的批邓基地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的中国，也正处于一场政治大地震的前夕。8月28日，正是地震后一个月，江青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小靳庄。

下午4时，江青等人抵达小靳庄。见了社员就说：“可到家啦！”“整天看文件，把我憋坏了”，“到你们这里才幸福”。

江青照例要干些农活，这一次是传砖。早有各路记者在旁伺候，他们的镜头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摄取了江青的姿态。刚传了几块砖，就有人来“干涉”江青，说是农活太累，江青理应为革命而爱惜身体。如此“美意”，江青自然领受了。可江青讨了好，还要卖乖，两天后，在天津另一处“视察”时，江青抱怨说：“到小靳庄都管着我，不准我搬砖搬瓦，我的‘公公’、‘婆婆’太多。”

随后来到抗震救灾战士的驻地，江青一副老爷派头，高声叫喊：“我还没有吃饭呐，我饿了，我还要吃药。”进了战士的帐篷，江青命令解学恭立即解散围观的社员，然后吃了社员送来的玉米面饼和稀饭，然后在帐篷里睡了一个小时的觉。

江青睡好了就主持座谈会。还是在村里转悠的时候，江青见到业已改名为“王灭孔”的王孝岐。此一时彼一时，彼时的“灭孔”，已经不合于此时的政治主题了，但王孝岐在向江青报告“我叫王灭孔”的时候，很有几分骄傲，不料江青却不冷不热地说：“不仅要灭孔，还要灭邓。”“灭邓”正是江青此行的主题，所以，江青的座谈会其实就是批邓座谈会。已经是晚上8点了，小靳庄政治夜校前的场院里灯火通明，各路批邓人马早已汇集在这里，除了小靳庄的代表，还有司家庄和窦家桥两个生产大队的代表。

首先发言的是小靳庄的党支部分书记兼民兵连连长。那位连长去年年底就曾派人到北大、清华，从迟群、谢静宜那里秘密领受了旨意，小靳庄的大批判也就由批孔转入批邓。就在江青到小靳庄的前一天，迟群和谢静宜还来过小靳庄，送来了邓小平的所谓“三株大毒草”。现在在江青面前，那位连长的批邓更是卖力。他控诉说，去年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胡说小靳庄是国家拿钱喂肥的。江青急忙附和说：“邓小平讲我们是学小（小靳庄）不学大（大寨），小靳庄要什么给什么，我可什么也没有给，有人为证。”她指了指解学恭，解学恭点头称是。往下的情形基本就是像这样的一唱一和，许多时候，与其说是那位连长在汇报，不如说是江青在主讲。那位连长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小靳庄的日子不好过，我们都憋了一肚子气。江青就说：“邓小平在政治局斗了我两个月，何况你们呢？”那位连长说，邓小平压我们，是我们的光荣。江青就说：“对！对！一个共产党员，没有敌人反对，那叫什么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压光荣。我天天挨骂，觉得光荣。”

那位连长讲到他们去年派人找了迟群和谢静宜，江青好像很生气，质问道：“你们忘了我啦！为什么不找我呀？”见那位连长有些莫名其妙，江青又改口说：“找他们也可以嘛！我昨天派他们来，让他们问好。”那位连长讨好地说，首长工作忙，当时就没有找。这下可引发了江青的怨愤：“当时不敢找你们，不敢找天津，找你们就遭殃了。”她越说越有气：“咱们是七、八、九，家家有，家家都受他的气！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造我的谣，造革命同志的谣，分裂党，分裂党中央。谁跟毛主席革命，他就打击谁。文化部、体委、小靳庄，都受他的压。他要把迟群和小谢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有我。他搞的那些比赫鲁晓夫的

秘密报告还恶劣。他要登基，当皇帝。”“我不怕，跟他们斗，斗了两个多月。”

小靳庄汇报完了，窦家桥的党支部副书记接着汇报说，窦家桥以小靳庄为榜样，坚决同邓小平对着干。江青评点说：“小靳庄受气了，名声太大，树大招风。”这一次江青又扯上了主席，说主席很宽大，邓小平犯了那么大的罪，主席却对他宽大得不得了。说邓小平还一直拿着国家最高的薪水，“享受超出资产阶级法权”，“他是个大家庭，有二十几口人，住最好的房子。他和孩子在一起，天天见面”。最后，她反问道：“你说主席宽大不宽大？”解学恭在一旁应和：“留个反面教员嘛。”

窦家桥汇报完了，司家庄的党支部副书记接着汇报。她讲到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顶住“逆流”，亲手为他们抄送材料，给他们极大的鼓舞。原来，那次在大寨举行的会议上，江青要把小靳庄的所谓“新鲜经验”强行塞给大会，邓小平抵制，说小靳庄今不如昔，粮食产量甚至还赶不上解放初期。江青气急败坏，当场和邓顶牛。还有，大会期间的报纸刊发了江青和邓的新闻照片，江青的那张是她正在大寨劳动，而邓的那张却是邓小平在大寨参观，这显然是江青操纵新闻媒体，有意与邓小平对着干。邓将这些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批评了江青。这次汇报，又一次勾起江青对邓小平的仇恨。她喋喋不休，历数邓小平的“罪行”：“他在主席那告我的状，说我乱插话”，“他斗我，跟在监狱里差不多，就差低头，揪辫子”，“他造我的谣，说我犯了错误，撤消了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劳动改造，自杀了”。江青每有“我”字必指自己的鼻子，末了，她环顾会场，低声道：“涉及到政治局的话，不要往外宣传，我是拿你们当亲人啊！”

批了邓，还得讲讲女权。江青此次还真能讲出一些“新意”。她说男的女的都是女的生的时，有人在笑，她又说男的很简单，只有一个精虫，更多的人低头含羞。江青不管这些，接着说：“我在政治局讲这些话，有人还撇嘴呢！这都是受邓小平的影响。”终于将邓小平与女权扯上了关系。说到最后，江青道出了她在政治局真实的野心：“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

#### ◇ 小靳庄的“文化革命”

江青宣布了小靳庄是她和解学恭的点，不管解愿意与否，他都得按照江青的旨意来经营小靳庄。1974年7月初，刚送走江青，解即返回小靳庄，一连住了八天。八天里，解领导的工作组总结了小靳庄的新经验，归结为以大办政治夜校为首的“八件新事”。总结材料写成后，解又向江青写信汇报，江青自是十分欣赏，批曰：“小靳庄办政治夜校的经验值得推广。”解学恭领旨，开始大力推广小靳庄经验，要求小靳庄周围的大队学习小靳庄，逐步小靳庄化。

小靳庄的“八件新事”，很快又变成了“十件新事”，并正式向全国推广。这个“文化革命”的新经验，以《小靳庄十件新事》为题，上了1974年8月4日的《人民日报》，小靳庄被塑造成“文化革命”或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十件新事”中，政治夜校是小靳庄“文化革命”的发动机，许多“新事”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至于唱戏、赛诗、大批判，乃是小靳庄“文化革命”的拿手好戏。还有几件“新事”却是子虚乌有，如开办图书室、成立体育队，都是别有用心的编造。另一件“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新事”，以“十二姑娘退彩礼”最为出名，却也是有人导演的结果。

作为“文化革命”发动机的小靳庄政治夜校，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新事”。在一个全中国都成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年代，政治夜校肯定不会是稀罕之物，天津市乃至全国的许多生产大队早已举办。小靳庄政治夜校之“新”，恐怕主要“新”在它的过度“繁荣”。据载，小靳庄政治夜校创办于1971年8月，到1974年6月江青来到小靳庄，已有将近三年的历史。此间，这个政治夜校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政治夜校没有大的不同，不过是广大贫下中农结合政治运

动，学习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唱几段样板戏，学写几篇大批判文章，也编几个快板之类的文艺节目，或者再写几首用于大批判的“顺口溜”。但是，江青来过，事情起了变化，小靳庄政治夜校不得不在激进的方向上，一天胜似一天地“繁荣”起来。首先是群众参与度高，整个小靳庄250名男女整半劳力，全都参加了学习，甚至几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也坚持上夜校。其次是学习的强度大，每周三次，坚持不断，老年人和家务重的妇女还要额外补课。一篇题为《小靳庄的政治夜校》的文章，刊于《人民日报》1974年9月8日，集中宣传了小靳庄政治夜校的高度“繁荣”。据该文报道，三年来，小靳庄共有一百九十多人学会了写大批判文章，一百二十多人学会了写革命诗歌；还培养了58名理论骨干，其中12人担任了夜校的教员。这支理论骨干和群众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出了十期大批判专栏，写出了一千二百多篇大批判文章。

自然，小靳庄政治夜校之“新”，还在于它的过度的文艺性。正是在政治夜校的动员和组织下，小靳庄的一支贫下中农业余文艺宣传队宣告成立。这支宣传队和举国上下其他的宣传队一样，也是以贫下中农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配合政治宣传，不同的是，小靳庄的文艺宣传队并不“业余”，它频繁出动，不管农忙农闲，也不顾场所，说演就演。当时的报道说，文艺宣传队带动了小靳庄文艺活动的广泛开展，出现了许多“夫妻同唱一出戏，全家男女老少齐登台”的“生动景象”。报道还说，“不会唱几段样板戏，在小靳庄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贫下中农把演旧戏用的蟒袍马褂等统统拆掉，卖给社员做缝补用的布料，用收入的钱买来一台电视机。电视机的一个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学唱样板戏。据统计，全村整半劳力250人，有220人会唱样板戏。不少家庭人人能唱，一些老人也会唱，73岁高龄的老贫农魏文惠能唱七八段。每次开会，干部带头，大家都唱。其他的时间和场所就更不用说了，“在小靳庄，地头、场上、饲养院、磨面房，从早到晚，到处都有人唱样板戏选段”。

在小靳庄，不会写诗，同样不光彩。也是干部写，社员写，男女老少都写。许多社员全家一起写，一位名叫于哲怀的贫下中农，一家七口，人人能诗，一家人还经常集在炕头上，互相修改润色。经常性写诗的贫下中农，全村高达一百多人。据说不到一年的工夫内，小靳庄的贫下中农就能高产诗歌一千余首。“新天新地新时代 / 公社社员多豪迈 / 满手老茧拿起笔 / 大步登台赛诗来”，将写诗纳入竞赛机制，在革命性之外又赋予它娱乐性。赛诗会一般在田间地头或麦场上举行，竖起“小靳庄贫下中农赛诗会”的大牌子，把贫下中农分作两队人马，赛诗会即可开始。参与者或站立或席地而坐，都是一副豪迈的样子。待到正式开赛，更是你方吟罢我登场，赛诗场立即成了战场：“笔似五尺钢枪 / 墨似子弹上膛 / 万弹疾发射靶 / 齐向林孔开仗。”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的短短几个月，小靳庄的赛诗会就赛了六场，有一百七十余人当场献诗，献出诗歌六百多首。

小靳庄“文化革命”的过度“繁荣”，正是江青一伙直接操纵的结果。自1974年开始，江青亲自或派人给小靳庄送来九批材料，还不时派“梁效”写作班子到小靳庄讲课。甚至在小靳庄，常年活动着江青派来的两名特殊的“联络员”。两人的活动十分诡秘，可以自由参加村中党团组织的任何会议，但他们的行动却不向任何党组织汇报。江青插手后，小靳庄的“文化革命”先是吹法家，批大儒，捧女皇，在唐晓文的指导下编写《新三字经》。经迟群授意，这一批成果编成《小靳庄诗歌选》和《小靳庄批林批孔文选》，均于1974年12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多次重印，总印数达一百五十多万册。继而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早在1976年2月7日，江青一伙即从北京打来电话，透露清华大学点名攻击邓小平的消息，向天津交了底。2月26日，《“十二级台风”刮不倒》在《人民日报》以头条发表，报道小靳庄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专开对头车”的事迹，一时间，小靳庄又被塑造成“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3月5日，解学恭亲临小靳庄，煽动说：“找到风源了吗？点名了吗？可以点名。”稍后，迟群、谢静宜一千人来到小靳庄，向王作山透风交底。也就在此时，《小靳庄诗歌选》第二集火速编成出版，总共一百五十多首诗里，直接或间接批邓的就有八十余首。

此间，话剧《红松堡》也正在小靳庄紧锣密鼓地炮制。这是一部《反击》式的“阴谋文艺”，以小靳庄两条路线的斗争为背景，将年轻的女支部书记宋金秀塑造成“造反英雄”，而将县委书记刘达这位老干部描画成“走资派”、“还乡团”的典型。又是“红色劲松”的象征，又是女的“造反英雄”，这让人时刻联想到江青，而小靳庄作为江青的“点”，自然成了“红色劲松的堡垒”。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理念，“文化革命”即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也就是“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唯有如此，才能清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从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体到小靳庄，在当时的宣传中，它的“文化革命”也共享“文化大革命”的“宏大叙事”，不外乎说小靳庄的“十件新事”乃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崭新成果”，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有力措施”。“十件新事”的出现，给小靳庄带来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抓革命可以促生产，因而小靳庄的“文化革命”促进了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近几年的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闯过了‘千斤关’”。但事实证明，“抓革命”未必就能“促生产”，蹦蹦跳跳说说唱唱不可能弄出粮食，小靳庄的生产“奇迹”不过是一种虚构。而江青在小靳庄的“文化革命”，也不过是借用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实际上贩卖的却是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

□ 百年潮 2005. 4

【史实澄清】

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

· 湘 人 ·

◇ 王任重与李达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是1953年2月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因为新中国的高等学校是接受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所以尽管武汉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李达是国务院任命的部管高级干部，但却同时接受教育部和湖北省领导。同时，李达也兼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由于这种双重关系，李达与王任重也有交往。再加上毛泽东来汉总要见见他，王任重作为东道主，虽然不是每一次都在场，但自然非常清楚李达与毛泽东的关系。

1958年，中共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王任重撰写《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一文，派人将稿子送李达征求意见。李达读后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恩格斯也没有说过‘超’嘛！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学习（包括读书和应用），发展是学习的必然结果。针对目前我们党的情况，一是普及不够，一是头脑发热，还是应当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

王任重接受李达的意见，发表其文章时把题目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却认为李达的意见是思想不够解放，仍然使用着不同时空、不同意义的“超”。他说：“我开始考虑这篇文章的时候，本来想用‘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样的题目，因为有几位同志不同意所以放弃了这个题目。如果说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但是如果说要超过马克思，那么有人认为这似乎太狂妄了。我想，如果不准说超过马克思，那么能不能说马克思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的一位神仙呢？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了真理的顶点，已经结束了真理呢？我看这样的说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那么超过马克思的提法有什么原则性

的错误呢？难道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没有超过产生马克思主义的19世纪吗？难道马克思不希望后来的人超过他吗？”

思想和事业自然是发展的，不同时空的人也可以延续和发展同一种思想和事业，但却不是同一时空人的“赶”和“超”。李达不同意或反对王任重的“超马克思”，当然不是指思想和事业的延续和发展，而是既强调时空的界线，又注重实际的意义。1960年，当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他惨淡经营的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刊物《理论战线》不得不奉命停刊时，他终于道出了他当年反对王任重“超马克思”的实际意义：“超过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超……超……超得好！我们这个刊物还是小事，饭也没有吃的了！”

1958年，武汉大学同全国其它高等院校一样，进入了所谓教育革命时期。虽然在“教育革命”高潮中，毛泽东于9月12日视察武汉大学，肯定了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的成绩，而李达却开始了痛苦的反思，对武大“教育革命”由沉默、抵制到公然反对。李达对于“教育革命”的这个态度，不能不令中共湖北省委派往担任中共武大党委第一书记的刘仰峤和书记刘真甚至中共湖北省委不快。因此，即使在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眼里，李达也不免同二刘等人一样有“碍手碍脚”之嫌。但是，李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行政级别定的很高，又与毛泽东具有很深的历史关系并与毛泽东保持不错的私交，因此无论在武大还是在湖北省委，都被视为“通天人物”，他们对李达除了敬而远之，似乎也没有其它的办法。

为贯彻“高教六十条”，1961年武大党委开展了整风，省委派宣传部副部长朱劭天来领导。经过非常激烈的整风斗争，继刘仰峤之后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的刘真被调回湖北省委，校党委两位副书记侯福珍、罗鸿运也被同时调离武大去郑州担任河南省国防工办副主任，改由朱劭天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但是，李达因为反对1958年教育革命以来“左”的倾向，在1961年整风中又发表了后来被指称为对1958年“教育革命”“反攻倒算”的激烈讲话，因而便得罪了刘真等许多“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即后来他们自诩的“左派”，埋下了以后“文革”置他于死地的祸根。

朱劭天是北平燕京大学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后来去延安，曾任陈云的秘书。南下后留在湖北工作，来武大前为湖北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本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朱劭天，熟悉教育工作，具有甚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开会讲话也十分中听。他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后，李达与他配合默契，工作显然顺手起来。

不意到了1963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的刘仰峤拟把在1961年整风调离武大的侯福珍、罗鸿运调回武大重新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已获得省委同意。按照惯例，他找李达谈话，以示通报。但李达认为他们不懂教育，不宜回武大工作。刘仰峤很不高兴，便直截了当地说：“这是省委的决定。”意思是省委听你的，还是你李达听省委的？李达本来对刘仰峤1958年在武大领导“教育革命”就有看法，侯、罗二人那时分别担任物理系和化学系党总支书记，正是因“教育革命”的“成绩”而被他刘仰峤双双提拔担任武大党委副书记，现在又要把他们调回复职，李达自然顶牛。他毫不退让地说：“那好，他们回来，我就不做校长；要我做校长，他们就不能回来！”说完竟扬长而去！

刘仰峤不顾李达的反对，准备给侯、罗二人下调令。李达果真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有人劝他，他说：“生姜愈老愈辣，犯错误就犯错误，为了这件事，总开除不了我的党籍！”杨秀峰是资深的共产党人，第八届中央委员。解放前夕，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30年代，与李达同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他接到李达的辞职电报，十分惊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事，何况还是发生在他这位大名鼎鼎的老朋友身上！他马上把高教部人事司司长叫来，将李达的辞职电报交给他说：“你赶快去一趟武汉大学，看李老遇

到什么坎坎过不去。你只了解情况，回来报告。你在那里不要表态。”

高教部人事司司长来汉后，立即造访李府，转达杨部长的问候。他说：“杨部长让我来问您老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坎，以至于要辞职。”李达见杨部长接到他的电报就派专员前来关心，心情很激动。他在如实介绍了他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这场人事纠纷后说：“是省委刘仰峤同志跟我过不去。”

高教部人事司司长回京向杨部长汇报后，杨部长对着话机向王任重通报情况后说：“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于是，王任重不能不过问了，两位副书记的调任只好收回成命。

翌年春节，王任重陪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还就此事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还请您老多加原谅。”李达感动地说：“我对省委也不够尊重，也请您和省委原谅。”李达此事在当年那个时候不无唐突；但后来“文革”说他是反对党的领导，却显然不实。

王任重此次去看李达，知道李达身体和心境都有问题，他也急了。他当即把常务副校长何定华找去谈话：“李老夏天去青岛，冬天去（广东）从化，你们要关心。没有钱，找省委，具体事你们办。”

但是，王任重却对朱劭天不劝阻李达给省委所捅的这个“漏子”有意见。后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对朱劭天说：“任重同志对你有意见。”意思是难道省委、特别是王任重还不能做好李达的工作，能让他打电报向高教部辞职？其实，这也是冤枉了朱劭天。因为李达给杨秀峰部长打辞职电报那天，朱劭天正巧感冒发烧未上班，完全不知道李达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事。1964年，朱劭天终于被调出武大，去广州任中南局科委副主任，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

1965年1月，李达当选为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央组织部已通知他留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还给他在京找了房子。他本人也于10月14日给武大党委写信说明原委，并要其家属将书籍、衣物搬去北京。但到12月中旬，中组部又派员向他传达：原决定系个别部长意见，现予作废。李达仍旧担任武大校长兼全国人大常委，既可住京，亦可回汉。他因急于向其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便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暂住。

可是，李达哪里想到，一场置他于死地的奇灾大祸就要降临到他头上了。他的赶回武大也就成了他“自投罗网”而抱恨终天之行。7个月后，8月24日，他就被迫害致死！

4月10日，广州开始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13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他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他点了李达的名，同时也点了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和刘节的名，并与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工作组。

4月21至23日，一连三天，王任重派车把武大哲学系助教陆某接到其百花村住所，听她汇报已经搜集到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指示她将她当面汇报的材料再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陆某原在政治系工作，1964年政治系撤销后才来哲学系。应当说，她并不怎么了解李达。但是，她居然搜集到了李达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材料！

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依据陆某提供的材料点了武大哲

学系和中文系的名。他还说：“武大哲学系，哲学史学四年，马列主义只学一年，毛主席著作只学六周。”“工农调干学生为反对学哲学史，被迫退了学。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么？”

28日，武大党委书记庄果向全校党员传达王任重的报告，并宣布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已派省委书记处许道琦和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来武大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王任重特别指示，要把李达斗倒，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根据这个指示，对他们所确定的“知情人”，包括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日夜追逼他们按已经定下的框框写交待、揭发材料，要求他们“拿出定性的东西来”，“一句话也要”。在那种“知情不报就是对组织不忠，对毛主席不忠”的时代氛围下，一些人出于对组织的忠诚，或出于自我保护，都不得不揭发交待。于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很快便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王任重加上夹批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

王任重在上报党中央的这份材料时又附信请示：“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附信还说：“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在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既不可能判断这份材料的真假，又没法不同意湖北省委的意见。

另一方面，省委又将这份材料报送5月上旬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局扩大会议讨论。陶铸再次强调批判李达是个大事，省委要派人去。5月12日，陶铸在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接着，中南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其中一个内容是进一步部署打倒李达“三家村”。

#### ◇ 李达成为“‘三家村’村长”

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后，6月3日，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的紧急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的报告，庄果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他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按：党办主任）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动员大会后，李达向庄果要他的“罪行”材料看，几经要求，6月5日，庄果才让把“教育革命领导小组”5月初整理的那份“初步材料”同李达见面。李达看了三遍，用他的秘书刘某向工作组密报的话说，“他基本上逐条反驳”。他说：“材料绝大部分是造谣，他们把话变了样，王任重看过加了按语，只听他们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不听听我的情况。”“他们讲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动派，我怎么能承认？我到死也不能承认是反动派！”

6月13日，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先让李达在家听实况广播，散会前，保卫科指使人把他揪到会场示众，被三次按下头来现场斗争，并被摄像。就在这一天，省市118个单位十几万人来武大声援和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来武大，持续半月之久。同时，湖北各地市县也召开各种声讨大会。



同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和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向社会公布武大揪出“珞珈山三家村”,发表报道和社论。以《湖北日报》为例,其第一版头版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发表王任重6月7日对武大的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下半版通栏标题:《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珞珈山,武大揪出朱劭天何定华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报道说:“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压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武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复地进行了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激烈的斗争。”第二、三版则发表了武大一些人揭露批判武大的“三家村”黑帮的文章和大字报。

14日,《湖北日报》第一版通栏标题报道“同声欢呼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众口齐诛珞珈山的‘三家村’黑帮,全省人民坚决声援武大革命师生,横扫一切害人虫”。第二、三两版则是报道声援情况。15、16日的《湖北日报》继续以整版的版面报道声援情况。

据《武大战斗报》16日报道:“截至15日晚上8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共达两千多个单位近三十万人,送来声援书十万多张,声援信五千五百多封,从全国六十七个县市来电七百八十四份。”“目前,在全国、全省、全市、全校已经燃烧起了烧毁‘三家村’的燎原烈火。”

但此时报刊电台对李达尚未点名,而以“某资产阶级‘权威’”代指。6月28日毛泽东来汉时,工作队(按:6月中旬以后,工作组扩大为工作队)还派人将李达住宅内外关于“打倒黑帮头子李达”一类标语、漫画、大字报统统揭去,洗刷得干干净净。究其用意,一是王任重在请示毛泽东:“李达的问题,可不可以上报点名?”一是考虑毛泽东万一来武大视察,不至于有碍观瞻。

李达在历史上脱党但始终宣传和研究马列主义,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在那“怀疑一切”的时代氛围下,人们亦怀疑李达也一定有“大问题”。王任重在《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加按:“李达同志的历史可不光荣啊!一九四九年以前你在哪里?”在决定打倒李达的中南局会议上,庄果也预言:“按一般情况,李达一定是在大革命时叛党的。”

6月30日,李达被报刊、电台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当日《湖北日报》头版下半版,在通栏标题《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之下,发表“编者按”说:“今天本报发表两个材料,一个是《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一个是《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两个材料,进一步揭露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黑帮的反动面目,这样,就便于同志们了解他们的反动言行,看透他们的反动本质,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批判,把他们斗倒斗臭。”

#### ◇ 李达向毛泽东求援

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消息顿时传遍武汉三镇。李达从门外雀跃的小孩知道了这一消息,不由产生了一线希望。17日,他试探地问刘某:“听小孩讲,毛主席来武汉了。”刘某因未得工作队指示,不便回答,只是冷冷地答说“不知道”。他迅即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耽心的正是怕李达去见毛泽东,便反过来让刘某去试探李达是不是有想见毛泽东的念头。

李达经受18日那天他家乡湖南零陵“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的面斗后，心里愈加愤怒。他甚至气愤地说：“我是叛徒，是叛的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他也更加痛苦，到19日很少说话。得到了工作队指示的刘某这时以关心的口气反过来问李达：“毛主席来武汉了，你是否想去找主席？”而李达却反而冷静了，他说：“毛主席在武汉，可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也可能不会接见我。问题这么多，毛主席怎么包得了！”刘某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也就放心了。

但到这天下午，李达的血压已升到了236/114，尿糖仍是4+。在饭厅床上量血压时，刘某劝他坦白交待，低头认罪，他“顽固猖狂”地讲：“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我顾不得别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量完血压，他背着石曼华叫刘某入内，“怒气冲冲”地说：“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回去，我就死在这里。”他对刘某说：“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问：“什么事？”李达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76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

随即，李达用毛笔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

李达这封信虽说是请毛泽东“救”他一命，但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的“将军”：“我写有坦白书，请你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

对于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李达要刘某马上送到。但是刘某因为还没有与工作队联系，不便答应，便推说：“今天已下午5点多了，明天一早送去。”

李达不依说：“今天就送去，你送去，要不找祝福庆、刘敬一（按：均为李达警卫，运动中已被调开）送去。”他还特别交代：“你帮个忙，送这封信到毛主席那里，你不要与工作队他们商量。与他们一商量，信就送不到毛主席手里了，他们会留下。”他似乎在提醒刘某：“这还是一场宗派斗争，刘真、侯福珍回来领导运动，他们来整我们几个人，非要把我们整死才甘心。”刘某顶他说：“省委不早作结论，武大没宗派问题。”他仍然说：“是宗派斗争，整我们几个人……”

5点半，刘某即到招待所向工作队庄果等三人汇报李达写信情况，交了信。庄果接后即行拆阅，在取信纸时还说：“呵，这是给主席的信啦，没有看见，糟糕！我犯了个错误。”因为其时已有作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反党集团成员的杨尚昆所谓私拆和扣押毛泽东信件“罪行”问题。

他们商量后，决定把信留下。庄果又告诉刘某如何向李达交代。他说：“你先到外面去玩玩，过一两个钟头再回去，对李达就说信已经送到毛主席那里了。”遵照庄果的指示，刘某晚上七点半回去见李达，讲信已经送到的情况。

李达问送信的经过，还讲主席是住在什么地方。但他又怀疑地问：“信是否真送到了？”刘某说：“怎么没送到？毛主席住的地方还有绿色篱笆呢。”李达似乎还不放心地问：“有收条吗？”刘某未想到此着，愣了一下，便支吾说：“信交给了警卫，他说给主席的信是不给收条的，他保证送到就是了。”李达由衷而充满期待地说：“辛苦你了，交给警卫，信毛主席一定能见到。”

直到7月29日，工作队陆某才让其秘书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陆某此举同样是出于所谓杨尚昆“私拆”和“扣押”毛泽东信件“罪行”问题。

6月30日报纸、电台点名批判李达，翌日，7月1日，王任重就拟向已来汉的毛泽东呈报《关于李达问题的调查综合材料》，并写下一段请示的话：“请主席阅。李达是个地主分子，又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即清洗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可否？请批示。”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又把写好了的这段“请批示”用红铅笔划去了。此后尽管他每天都能见毛泽东，却并没有向毛泽东呈报请示。毛泽东决定7月18日晨离汉回京。17日晚上，他在东湖召开省委常委，一举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这个《决定》没有经过任何一级基层党组织的讨论，也不听李达本人的申辩，属于运动中的“热处理”，而不是通常运动后期的“落实处理”；并且属于“文化大革命”的罕例。

这个《决定》也开列了一些强加给李达的“三反”言行，明文肯定了李达“是个老叛徒”，但却既不给李达戴“三反分子”帽子，也不以“叛徒”罪名清洗出党，却只戴“地主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并“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管制劳动改造”。

这个《决定》连同《关于开除李达党籍的请示报告》上报中组部，由该部八处于7月27日呈送已调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批阅。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的8月1日批复：“同意你们给予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但是，李达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了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写这张条子的人当然就是收到武大所寄李达给毛泽东救命信的人，他注明“武汉大学”，是因为他知道除了“文”李达，还有“武”李达，即刘邓大军的参谋长、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达上将。毛泽东看到的只是这张条子，并不是李达的原信，自然不知李达的其它话语。但对于李达的求救，他岂有不允之理，当即使用他那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

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但是，无论是毛泽东对李达“救命”信的批示和对王任重的当面指示以及王任重向毛泽东的保证，都没有传达，武大的师生也无从知道。但到8月中旬，省长张体学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却对武大校文革传达了毛泽东对李达问题的这样两点指示：毛主席说李达是没有什么用了，我相信武大革命师生是不会对李达采取过火行动的。

8月16日，张体学一行来武大，临时召开师生员工3万人大会（包括附近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等院校）。性情豪放、快人快语的张省长对李达问题又讲了一番能烘托当时“革命”气氛的话：“李达，过去我们叫他李老，现在我们叫他老不死。他现在已经搞臭了，你们再用不着斗他了。你们一定要相信省委，把他交给我们处理。让他进博物馆，吃饭、睡觉、拉巴巴！你们也可以回家看妈妈。”

#### ◇ 李达之死

自7月中旬进入批斗高潮以来，李达胃溃疡复发，糖尿4+，血压已升到236/114，常感“头顶发麻”，心力已感衰竭。但他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最后是在家听批斗实况广播。由于他已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校卫生科也停止了对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D860药也停止供应。李达的病情愈来愈重，到8月上旬，他已感到极度虚弱。他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他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据当时武大卫生科医生说，李达虽年

老多病，但按他的体质和病情，如果保持正常条件，稍加医疗照顾，三五年内是不容易死去的。但此时已既无正常条件，更无照顾医疗了！李达因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行政6级，在正常条件下，他不仅享受特殊医疗待遇，而且有防痨专家、武汉医学院李晖教授的亲自诊治，他的治疗和保健当然不成问题。但是，现在他遇到了极不正常的条件，他也就是脱毛凤凰不如鸡了，连自费治疗的请求也得不到准许，哪里还谈得上医疗照顾呢？

8月13日黎明，李达在卧室突然摔倒，仰卧在地，脸色苍白，口吐鲜血，连血都喷到了墙上。监视人员不仅不去请医生，反而斥责李达夫妇在耍花招。当日上午9点左右，卫生科医生来探视，诊断可能是胃出血，血压也陡降为90/50，随时有发生休克的危险，建议立即送医院治疗。刘某去工作队请示，医生也去向工作队说明诊断情况，但却被一句“研究一下”的话推搪了。上午11点才由护士来打针止血，却并未给药。

19日晨，李达高烧39.4℃，又从床上摔下，监视人员仍漠然置之。到20日才来一位护士打针。她发现李达小便带血，大小便都拉在床上。她要去向医生反映情况，也被制止。

李达自知年事已高，现在又病处垂危，但他仍在顽强地坚持生存，不想就这样戴着一大摞黑帽子死去。他尤其寄希望于和他有几十年友谊的毛泽东！他对夫人说：“等病好了，我们就离开武汉大学，我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向毛主席告状！”于是，他最后再一次向庄果请求允许送他去医院。他悲愤地说：“印度战俘有病，我们也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你们把我当敌人，我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吧，你们也应当让我治病呀。”然而，他的请求仍未被准许。

自8月13日胃出血倒床后，心力衰竭，李达很少说话。他的住院请求被拒绝后，自知不久人世。17日，他终于嘱咐妻子：“我如死去，请转告托德麟同志，我唯一的恳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一直到8月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作队才叫刘某等2人将他送往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准夫人石曼华去护送和护理。李达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对夫人说：“他们不让你今天去，你好好带媛媛，明天来看我。”于是，李达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达三家村意）住进普通病房（按行政级别，李达是当时整个武汉地区两位6级干部之一，当住高干病房）。第二天，秘书刘某来找石曼华，说他马上去医院，要她买些鸡蛋糕交他带去。石曼华要求一起去，仍然遭到拒绝。她请求带一点牛奶去：“他是靠牛奶吊命的。”但刘某还是不愿意。结果，石曼华只好买了四块鸡蛋糕和四个梨子给他带去。医院每天早餐是稀饭馒头，中、晚餐则是干米饭，李达粒饭未尝，石曼华托刘某带去的鸡蛋糕和梨子，也原样未动。只三天，8月24日，李达便撒手人间，含冤死去。

李达死后，25日，遗体即被火化。当天晚上，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李达已死，宣读中央陶铸批复的那份《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1967年春，武汉大学部分群众组织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这年夏，王任重也受到了部分群众组织的严重冲击，并从此身系冤狱近8年。

王任重在接受武大为李达翻案的群众组织盘问时说，对于打倒李达，他先后三次直接请示过毛泽东。第一次，杭州会议期间，他问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泽东不表态；第二次上海会议问，毛泽东仍不表态；第三次问，毛泽东才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这也就是前文所说直到1966年6月30日李达才被“报纸、电台点名批判”，而此前一直被报纸、电台冠以“某资产阶级‘权威’”的原因。

1985年，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在武汉大学纪念李达诞辰95周年的会上披露了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当面论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举座皆惊！人们也更加由衷地敬佩李达的睿智和胆识。但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却于1989年3月撰文《满篇谎言》，认为梅白所披露的这场论争“全是一片谎言”。他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种主观主义的口号毛主席没有提倡过，湖北省委也没有提倡过。”但是，所幸梅白并不是孤证，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之22节也述说了这场颇有兴味的哲学论争。

然而，正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终于说到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一个是李达，一个是张体学。他所说的对不住李达的地方，不用再说了；而他所说对不住张体学的地方，大概是指1959年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批张体学的“右倾”吧。张体学同样是革命家，王任重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他担任第二书记兼湖北省省长。他虽然文化和理论水平不很高，但却是一位性情豪爽、快人快语、体察民情、关心民瘼的好省长。不过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了。

□ 《炎黄春秋》 2006年第2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